

附庸风雅

1 拍卖公司经理曾有一半客户是官员

“小杨，晚上来局里休息室打乒乓球，派车接你。”曾经在全国大学生乒乓球比赛中夺魁的小杨(化名)，常接到领导干部的“邀请”——陪练打球。这让原本在学校读书的他知道，原来乒乓球是官场风行的爱好。

官员的爱好不止于此，菏泽市曹县某局局长王阳(化名)则经常听到不少官员谈论书画，而他自己也是一个摄影爱好者，经常跟一群发烧友外出采风。官员有爱好，自古有今。远到宋徽宗爱蹴鞠，近到邓小平好桥牌，再到玉石收藏、舞文弄墨，甚至杀猪，广东韶关原公安局长叶树养有个特别爱好——杀猪。有个别基层领导投其所好，备好肥猪供其下来检查工作时“小试身手”。

山东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、山东孔子学会副会长程奇立说，自西汉以来，要融百家，独尊儒术，中国的官员大都是通过严苛的科

举考试选拔而出，而考试内容便是四书五经、诗书辞赋。他们有很高的文化素养，诗词、书画、建筑、篆刻这些雅好便自然成为古代官员身上的规定“标签”，即使是新中国建立后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领导人也是身传统文化的“血脉”，不乏诗词、书画的雅好。

然而如今，官员的爱好却比普通人多了一道“玩味”的标签。

济南泽润斋拍卖公司经理张经纬从业近十年，他的客户群有两类，一半是企业老总，一半就是政府官员。“政府官员中，60%不是真的喜欢，说白了，就是附庸风雅。”张经纬说，“这从他们的知识和鉴别能力就能看出来，很肤浅，一看就不是自己研究，大多是听来的。”

“中国传统文化对文人和艺术有一个尊重的情结在那儿，每个人都希望在别人心目中是个有文化的人，是个爱好艺术的人，尤其

是官员，需要这样的包装。”著名官场小说家浮石说。

在程奇立看来，这是由历史背景决定的，他说，“五四”时期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否定，加上新中国政权建立时不少革命家仍是“工农”出身，许多新中国官员以“大老粗”为荣和自居，电视剧《亮剑》中的人物李云龙和丁伟“一身匪气”，“半个大字不识”，便是当时不少官员的真实写照。经济恢复和阶级斗争为重，文化爱好并非那个时代官员生活的“关键词”。

“进入当代社会后，时代改变了人们的情趣。随着传统文化回归到人们的生活与主流话语之中，人们对风雅场，琴诗画重新钟爱起来，其中不乏一些官员爱好者。”程奇立说，如今，虽然官员大都是“理工科”出身，但不全是面子问题，还是真正希望提高个人的修养，爱好诗书，仍称得上是中国官员的一个修身传统。

八项规定后官员爱好转向 饿了拍卖行 累坏乒乓陪练



这两年，张经纬的日子不太好过。八项规定实施后，他的古董店流失了70%的官员客户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本来在国企舒舒服服上班的小杨，因为自己的乒乓球特长，累得辞了职。

“有的领导需要有人递水、捡球，而我必须要把球喂到一个好位置，好让他不用挪一步。”小杨陪练的规矩不少，“我原来一个星期顶多打三四天，现在变成了一周有六天下了班就要陪领导打球，下午五点到六点陪一个，晚上七点到十点再陪一个，真是受不了了，打球打疯了。”

本报记者 陈玮 张榕博 实习生 张俊其

隐秘的行贿

2 上级逛古董店，过几天陪同的下属来买

当爱好成为中介时，后面还会有一个更大的漩涡……

“这相机放到你这儿，我回来的时候我用，我走的时候你用。”当时任河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副主任秦玉海听到这句话时，他可能想不到，此时他的雅好已然成了行贿者谋私利的突破口。

玩“概念摄影”的落马贪官秦玉海被热情的“同好”曹俊生变相赠送了阿尔帕、G17等昂贵器材，加上闪光灯、三脚架和一系列与之般配的摄影设备，市价已不低于20万元。当老秦落马时，还害得工作人员满院子捡他丢弃的相机配件。

张经纬说，有上级带着下属来店里看古董，经常翻来翻去什么都不买，但是过几天，就有随行的路人买走了那位领导夸赞过的东西。

官场潜规则

3 “陪练局级干部后，处长再也不找我了”

张经纬说，不少官员干脆直接让自己教一些速成的古籍知识，笑称好跟同事沟通。但其中很多政府官员上来就会要哪套书哪个版本，或者固定哪的刻本，熟了以后才知道，是领导喜欢，自己多了解了，”也就是投其所好。”

爱好，在装点门面的同时，又成了勾兑关系的中介。

“古人都说‘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’。”王阳说，官场中确实存在按照领导喜好发展自己爱好的情况，只是为了迎合、追捧。小杨说，有的下属为了能陪上级玩，专门找他练乒乓球。小杨之所以能有机会陪局级领导打球，就

是有下属在某运动场所偶然认识做陪练的小杨，把他介绍给自己的上级，“因为打乒乓球，两个人处于面对面的位置，情感上容易接近，很多事情好沟通。”

秦玉海落马之前，他所拍摄的云天山作品，几乎在焦作所有酒店和服务场所悬挂，甚至有专业人士为他摆放好设备、调好数据，他只需按一下快门即可。

“楚王好细腰，官中多饿死。”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马广海说，比如领导喜欢穿中山装，下属便不会穿奇装异服。“我想没有一个成熟的官员会冒这个风险，他们会尽可能地跟领导保持一致。这也是下级官员揣摩上级官员

的喜好所采取的一种很自然的模仿或反应。”

与常人爱好不同，在官员的爱好圈里混，还要谨小慎微。小杨说，自从陪局级领导打球以后，以前陪练的处级干部就再也不找他了。“找上级领导用的人，是官场的忌讳。”最让他头疼的则是琢磨领导的心思。“比如有时候练着练着要打比赛，这时候对我就是个考验。”小杨说，有的领导就是想凭真本事，好知道自己弱在哪里，有的觉得他比你地位高，就必须赢。“最开始，我就看我赢了第一局之后领导的表情，如果对方夸奖你，并且精气神没什么异常，那就说明无所谓。要是说话夹枪带棒的，下一局我就必须输。”

爱好变作风不变

4 有的要求下属观看时不能走动，有的找好几个人捡球

八项规定出台以来，反腐倡廉之风在改变党风民风的同时，也让官员的爱好变得有些不一样。“现在没人送字画古董了，都不敢了。”王阳说。

张经纬的古董店流失了70%的官员客户，拍卖会上也罕见官员的身影。“本来他们也不是真的喜欢，不会去追求这个东西，所以一有事情出现，就赶紧停手。”

“八项规定出台以后，我很多书画界朋友的生意可能要减少三分之一。”浮石说，现在在微信等社交媒体上会看到，很多官员画家作品的价格，就像房地产泡沫一样被挤掉了，因为市场需求已经萎缩了。“我认为，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。虽然看起来书画市场在萎缩，实际上，它正在回到艺术品创作、艺术品交易的本来的样子。”

不少官员开始收敛自己的爱好，小杨说，通

过打球认识一个爱好摄影的省级干部，他曾经在世界摄影大赛中获过奖。“原来他经常拿出相机，说价格几万，多么贵重。现在他很少参加活动，偶然参加，带的相机也都很一般，对外都说三四千块钱。”

八项规定的执行，让真有爱好的官员处于尴尬的境地。“该不该有爱好，有了爱好能不能拿出来？”身为官员的王阳也拿捏不好。

“官员不是不能有爱好，像王羲之、颜真卿，都是高级官员，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名家。”马广海说，爱好与廉洁没有必然的联系，而是要看爱好的目的是什么、通过怎样的方式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越来越多的人瞄向了更安全 的爱好，半年前，小杨辞去了看似体面的国企工作，原因是“天天陪练陪疯了”。

“八项规定出台以后，官员们都不出去吃饭喝酒了，也没什么交流，就转向了打乒乓球。我

原来一个星期顶多打三四天，现在变成了一周有六天下了班就要陪领导打球，下午五点到六点陪一个，晚上七点到十点再陪一个。”

小杨说，八项规定出台以后，对于官员的实干要求高了，吃喝没有了，担负的责任也重了，需要释放。再加上之前饭局上经常被人捧，习惯了就戒不掉，也需要这样的场合找回一些东西。

“比如我陪一个国企老总打球，他要求下属必须坐在底下看着，有一个走动的，他就停下不打了，说影响他注意力。下属都老老实实坐着，不时喝彩。有的领导只需要原地打球，有人递水，有人捡球，都不用挪一步。最夸张的是有一次陪一个首长打球，找了好几个人专门给他捡球。我必须把球喂到一个好位置，好让他打得舒服。”小杨说，“有些东西，不是改了就没有了。”

官员爱好的正能量范本——

帝师也差钱

古董商：拓本四两
翁同龢：三两
古董商：不行
翁同龢：那不买

张之洞借润笔费宰土豪兴实业

在科举取士、光宗耀祖的封建社会，官僚士绅以读书为进身之阶，这虽然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，但在客观上造就了一种“读书——为官——为文”的社会风气和文化繁荣的局面。

从西汉至清末，封建社会官员的另一大雅好便是书法绘画，但能真正喜爱书法，并委以精神寄托的却不多。苏东坡有一段名言：“笔成冢，墨成池，不及羲之即献之；笔秃千管，墨磨万锭，不作张芝作索靖。”能有这样的境界，绝非兴趣这么简单。

在《曾国藩家书》中，详细介绍了练习书法的要诀，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三，曾国藩写道：日内颇好写字，而年老手钝，毫无长进，故知此事须于三十岁前写定规模，自三十岁以后只能下一熟字工夫，熟极则巧妙出高。他禀告母亲，让弟弟写字养神的故事广为流传。



虽然官员送字一般不收费，但其中也不乏借机牟利者。明朝中期后，社会上向官员购买墨宝和文章的风气已然不可遏制。经常有百姓向官员、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求字、求文。官员“勉为其难”地应承下来，写完后再半推半就地接受一大笔润笔费。到清朝，这股风气越来越盛，润笔费用越来越高，成为官场半合法的收入，占了部分官员收入的大头。

不过也有借润笔费干实事的，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时期大力发展近代工业，因为兴建近代工业缺钱，就打起了润笔的主意。有个土豪的父亲生前名声极衰，为了美化父亲生前的斑斑劣迹，他就想让张之洞执笔为父亲写个墓志铭。

这一篇文章张之洞狠狠宰了土豪一刀，真是做到了一字千金——一字一千两。

本报记者 陈玮 张榕博 实习生 周一

找中介雅贿的招，胡雪岩早用过

藏书作画可以陶冶情操，也能经世致用，但如果把这些雅好“歪藏”，那便成了雅贿。

在汉元帝时代，宫女不惜花费重金贿赂画工以求美貌，此事被认为是雅贿的源头。

明沈德符在《万历野获编》中记载嘉靖年间的大贪官严嵩的“雅贿”之好。沈氏说：“嘉靖间籍没严分宜(严嵩乃江西分宜人)，则碧玉白玉围棋数百副，金银象棋亦数百副，若对局之用，最为滞重不堪，藏之则又无谓。”

到了晚清，雅贿之风更加盛行。京城有个“琉璃厂”，专卖文房四宝、书籍、古董、字画，里面不乏名人真迹，价格不菲。不过，也有人甘愿高价买一些艺术造伪一般的作品。

“这些字画大都是当朝一些官员所画，虽然艺术造诣平平，但是却能在市场上卖得高价，原因便是有人托市，借此向官员行贿，或是官员借此洗钱。”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杜贵晨说。

相传光绪七年三月，胡雪岩来到北京。他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疏通中央政府，以达到清廷同意由他向洋人借外债300万两的目的。

那时，满人宝鋆任户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，胡雪岩想要借外债，必须打通宝鋆这一关节。胡雪岩想出了一个办法，与琉璃厂挂钩，由商家担任贿赂中介。

胡雪岩事先打听清楚宝鋆家客厅挂着一幅明代唐寅的《看泉听风图》，他就到琉璃厂找到一个和宝鋆熟悉的人，让其去宝鋆家联络，告诉他人喜欢他客厅里挂的那幅画，愿意以3万两银子购买。宝鋆心照不宣，自然顺利成交。

就宝鋆而言，他只是把自家的字画交给琉璃厂商人，再由商人卖出，并没有直接收受胡雪岩的银子，这算是文人雅士间的人情往来，并未沾上铜臭。

还有一些官员，古董知识有限，于是他人想要进贡，送的就是金银珠宝材料做的。一些西洋物件是送礼的选择，西洋时钟、打簧表、鼻烟壶都是雅贿佳品。

二十年的大半俸禄都用来建藏书阁

琉璃厂里晃悠的，不止打着“坏主意”的，不少官员是真心喜欢风雅的古物。

翁同龢纵为同治、光绪两代帝师，也不得不为一两银子折了面子。他的日记中，有不少和琉璃厂的古董商讨价还价的有趣例子。

1867年正月十四，翁同龢在琉璃厂见到一本汉代礼器

孔子讲，不学诗，无以言；不学礼，无以立。在藏书热之后，官员的另一大雅好便是出书。

满清开国状元傅以渐便纂修《明史》。《清太宗实录》等文献著作，曾国藩、翁同龢、左宗棠、龚自珍等官员，亦学亦官，今天留存了不少这些学者官员的著作，其中《曾国藩家书》更是被今天的人们喜爱。